

竹企思想文化叢書

中國文化六講

何茲全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思想文化史研究室

竹企思想文化講座

緣起

「品質、成長、社會責任」是新竹區中小企業銀行一貫的經營理念；「我們的竹企，大家的竹企」是我們一向秉持的服務態度；「取之社會，用之社會」則是我們回饋社會的具體作法。因此我們除了全力以赴地經營金融事業以帶動地方工商經濟繁榮之外，也希望在能力所及範圍之內回饒地方。

近年來政府大力提倡文化建設，新竹市也有建立文化科學城的構想。我們相信文化建設本身有它的重要性，也相信文化建設對政治、社會、經濟的發展有積極正面的意義，因此如何加強文化建設、充實文化內容、提昇文化生活品質，應該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

文化建設的重要性與迫切性雖然不容置疑，但是文化建設也是千頭萬緒，且非一蹴可幾。而用講座形式，邀請國際知名的學者專家作系列演講，並把講稿出版為叢書，卻不失為一種可行而根本的辦法。我們希望「竹企思想文化講座」與「竹企思想文化叢書」能對學術研究有所貢獻，也能對文化建設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最後特別感謝國立清華大學張永堂教授的提議，使我們有機會在文化建設

二 緣 起

中略盡棉薄之力。

新竹區中小企業銀行

董事長 詹紹華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日

總 序

「清華大學思想文化史研究室設立之目的，在於配合現代人文學研究之需要與趨勢，加強中國思想文化史之研究，為中國史學與人文學研究開拓新境域，一方面企圖使思想文化史研究與歷史研究緊密結合，以相得益彰，而更有助於理解歷史之真象，一方面務期思想文化史之研究能與史學領域以外之政治、社會、經濟，乃至科學各領域密切聯繫以達到科際整合之效。」（《國立清華大學「思想文化史研究室」設立計畫大綱》，頁1。）

〔思想史和文化史〕

「思想文化史」是比較新的名詞。這一名詞有兩種不同的意義和用法：第一種比較舊的用法是把「思想」和「文化」作為兩種不同的研究對象；「思想文化史」意指「思想和文化史」，或「思想史和文化史」；思想和文化，或思想史和文化史，兩者有很密切的關係，常常須要兼舉併提，但在觀念意義上，仍為二事。國內使用「思想文化史」此名詞者，大多數在有意或無意中

四 總 序

傾向於這種想法。第二種用法是把「思想文化」視為一詞，所指者為一事；這是比較新的用法，涵有不少新義，在國內還很少人認真注意提出來討論。

把「思想文化史」作為一特定新名詞，合「思想文化」為一，對當前國內學術，有兩種特別意義：第一，這個特定新名詞，可以用來作為翻譯英 Intellectual History 的比較適當的中文名詞，主要針對 Intellectual History 和「哲學史」(History of Philosophy)，「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及「心態史」(History of Mentality) 的分野。第二，這個名詞的新義突出了思想和文化的特殊關係，並強調思想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正好呼應了世界各國人文學理論（包括「後現代主義」，尤其是「新歷史主義」）發展的新趨勢。下面針對這兩點意義，略作析述。

中文對 Intellectual History 一直沒有適當的譯名，一般大都沿用「思想史」一名。治 Intellectual History 者都知道它和一般通稱的「思想史」有所不同，但卻找不到一個更恰當的新譯名。英文 Intellectual History 一名詞之使用，有不少特別意義。這名詞和 History of Philosophy (哲學史)，History of Thought (思想史)，History of Ideas (觀念史) 等文義的不同，在於 Philosophy (哲學)，

Thought (思想), Ideas (觀念) 等本身是一獨立的名詞, 其內涵可以單獨作為史學研究的對象; 而 Intellectual 是一形容詞, 只能用以規範和描述某種史學研究, 而本身不能獨立作為史學研究的對象。在實踐上, 哲學史家可以不涉及一般歷史而單獨研究哲學或哲學思想的發展; 思想史家, 觀念史家亦然 (「心態史」有異於此, 以後再作分析); 治 Intellectual History 者, 則不能不涉及歷史事實去單獨研究「智慧」或「人之知性」, 而是要研究人在歷史中「用心之處」。

從這一點來看, Intellectual History 牽涉了過去人類各種的活動和經驗, 也就是歷史的全面。這包括了: 人對自然環境和物質條件的認知與適應 (人與物的交互關係); 人對人群生活、組織、和制度的因應和改造 (人與人的交互關係); 和人對未知或不可知的世界之想像、嚮往、信仰和崇拜, 以及人對自身的經驗、知識、和心思的反省反思 (宗教信仰、精神、抽象思考和哲學) 等三方面或三層次。1991 年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校區的美國思想文化史專家 Robert Kelley 教授曾經精心選擇美國近十幾年來 (1976-90) Intellectual History 的代表作 55 種 (約每年 1-7 本書), 此書目包羅萬象, 包括地區社區文化、勞工的生活、宗教史和哲學史等等的研究。(1) 從這一點來看, Intellectual History 和「研究人類過去一切的活動、經驗、和成績的總和」的「文化史」很相似, 兩

六 總 序

者常常趨於混同。

不過 *Intellectual History* 並不等同於「文化史」；在美國治 *Intellectual History* 的學者很少自己認同於「文化史」；甚至可以說他們選擇 *Intellectual History* 這一獨特的學科名稱，也隱涵著和「文化史」劃清界線的意思；近年歐洲的史學界也特別提出「文化史」和 *Intellectual History* 的分界問題。(2) 這種把「思想史」和「文化史」劃清界線的要求是一新趨勢；在人文學術理念和發展機運上，主要是對在「科學主義」主導下，「文化史」和「文化學」過於注重物質文化和社會經濟等基層架構的反彈。

美國人類學家克魯伯 (A.L.Kroeber) 和克拉克孔 (Clyde Kluckholm) 合著《文化觀念與定義評述》(1952)，列舉西方從 1871 年到 1951 年間對「文化」所作的一百六十多種不同的研究和討論所連帶產生有關「文化」的各種不同的觀念。其中最廣泛的文化定義，如：「(文化)是人們一切活動的總和，而表現在其業績者，以及其他可被發現的特性。」「(人類)一切活動、習俗、和信仰的總和。」「一切最廣義的社會活動，如語言、婚姻、財產制度、禮儀、工業、藝術等等。」「文化是人的生活活動的結晶層。」等，指的都不是人們生活活動本身，而是其活動之業績。這是「文化」或「文化史」和「歷史」不同的地方。(3)

「業績」帶有優良、改良的意義，所以「文化」雖然可以指「初民低層文化」如石器文化，但 Culture 和 Civilization (Civil) 總帶有「教養」、「文雅」意義。因此文化研究與自孔德 (August Comte, 1798-1857)，密爾 (John Stuart Mill, 1806-73)，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以來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和「進化論」(由「進步」 progress 及「文明演化」 cultural evolution，而「進化論」 evolutionary thought，而「進化決定主義」 Evolutionism) 等觀念是水乳相融的。(4) 相對而言，歷史變化則是曲折的，而不是單線直進的。

「業績」要在人群中傳承；「教養」、「文雅」要在人群中表現，「進化」更是群體歷時長久的進步歷程。客觀文化研究因此注重人群社會。文化學者對「文化」的定義大都不能離開「在社會中的 (活動、習俗、生活方式、語言思想信仰等系統...)」觀念。是以廣義的「文化學」逐漸被廣義的「社會科學」所取替。雖然「文化」仍然是「人類學」最重要的基本觀念，但是在「科學」主導之下的趨勢，卻是把「文化」簡化為以物質文化、社會經濟為基礎的「文化學」和「文化史」。(5)

這種趨向，法國「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 史學是一明顯例子。自 1940 年以來居於法國史學正統地位的「年鑑學派」，由

八 總 序

倡議著眼於一歷史時代的文化全體，逐漸變成注重基本地理環境，物質條件和社會結構，其支流「心態史」亦特別注重用統計方法研究某一社會階層的集體心理狀態。「文化史」主要是物質文化史，而思想史主要是研究物質條件，社會背景如何影響和決定一人、一群體、或一時代之思想。據統計，1965-1984 年間在《年鑑學報》(Annales) 發表的論文，有一半以上是關於經濟、社會、人口方面的題目，政治史只佔 11-14 %，思想史和文化史情況比較好，約佔 35 %。但即使在思想史、文化史、乃至別出的「心態史」(Mentalites) 方面的研究，都不免帶有用「基層文化」決定和解釋「高層文化」的特色。這是在西方思想史的發展趨向於與文化史合流的一主因。(6)

思想史和文化史合流的傾向有二：一是視思想為一切文化的內蘊精義；二是視思想為文化的上層架構（意識型態），是下層文化的一種反映或投影。第一種傾向在西方淵源悠長，可以說是西方古典哲學、歷史哲學、和早期「文化學」的共識。第二種則是在「科學」主導下「文化學」及「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傾向。從這傾向來看，「思想文化」既然是下層文化的投影，其意義和本質主要由社會經濟和物質文化狀況所決定研究；「思想文化」的著眼點便不放在「思想文化」本身，而放在其社會經濟及物質文化基礎。於是社會科學取代了文化學，而社會史取代了思想史

的內容。此一傾向，在當代中國學者中尤為強烈。

〔思想文化史的舊傳統與新機運〕

上述以思想為文化的精粹或主導，或至少有其獨立的價值和自主的範疇的第一種共識，雖然似乎處於弱勢，卻並未失其故步。值得注意的是聯合國成立以後，其「教育科學文化組織」自1954年開始即籌備撰寫一《人類科學文化發展史》(UNESCO: *History of the Scientific and Culural Development of Mankind*)。此一聚集世界各主要國家史學精英，歷時二十多年始完成之歷史巨著，「主要工作」即為：「建立人心的發展史，尤其是它（人的心靈）的最高的文化成就。」

此書總序中特別指出：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建立之基本前題為此一信念：即國際關係終極之實質並不只由政治及經濟因素所決定，而更確定地源出自心靈之能量與需求。」

「文化和科學事實，無論其內涵、方法、主因、藉口、或背境為何，基本上都是與人相關的思想。」(7)

十 總 序

即使在「文化學·人類學」的領域中，精神、心靈、思想的重要性亦未完全被忽視。早期的 E. B. Tylor 的 *Primitive Culture* (1871)，副題即為「神話、哲學、宗教、藝術、風俗發展之研究」，他認為「人的知性思想為創造及決定文化之主要因素」，是謂「知性思想主義」(Intellectualism)。其後 Franz Boas(1858-1942) 雖反對「人的知性思想」而認為人的行為及文化乃由非理性之情感及其他文化成見(觀念)所決定；Ruth Benedict (1887-1948) 則認為個人的心靈對外在文化可作選擇、拒絕、或修改。A. L. Kroeber (1876-1960) 認為現實世界為文化第一義，價值文化為第二義。Julian Steward (1902-1972) 更只注重外在客觀的現實文化(自然環境、物質條件、生產技術等等)。但在法國有重要影響力的 Emile Durkheim (1858-1917) 則認為文化之主體為「觀念信仰系統」，不過他認為此系統屬於「集體意識」，在社會中有約制個人之文化權威，而最重要的是此等「觀念」對此社會成員之意義(是以觀念的意義是主觀的)。而 A. R. Radcliff-Brown (1881-1955) 則重申個人「知性思想」的重要性 (Intellectualism)。E. E. Evans-Pritchard 更採取了人文歷史學家如克勞齊 (Benedetto Croce) 及柯靈烏 (R. G. Collingwood) 把人文知識與自然科學知識截然分開的主場，認為人的歷史不能只從外面去觀察，而要從內心(個人的目的、希望、觀念、價值、與決心)去了解。而外在的政治社會結構

每每由內在的價值觀所決定。(8)

法國的「新文化史、新思想史」學者傅柯 (Michel Foucault) 雖然未能完全擺脫法國社會學的大傳統，但他的研究焦點已由「社會」轉回到「思想」本身，於是引起上述「新文化史」應該以「社會」或「思想」為核心，抑或「文化」自有其核心的爭論。這種爭論發生在以科學實證主義為主流的「社會科學」的大本營的法國，尤其重要。(9) 在美國，語言分析哲學認為人對真理的認知脫離不了語言，而語言是人文現象，因此對真理的絕對性發生懷疑。人文顯示的是「意義」，不是「真理」。對於把歷史「自然科學化」，把文化「物化」，把思想研究依附於社會經濟研究，希望求得一絕對客觀的定理定律的可能性產生懷疑，而認為歷史的目的是在追求了解人，了解文明的意義。此知識論上的懷疑主義，亦影響美學和文藝理論。文藝亦由追求客觀形式的純理想「美」而趨向追求人生的意義—具體存在的意義—亦即在歷史過程中的意義。文學的研究注重文學作品文化意義的研究，特別注重人的思想、意識、精神的歷史意義—「新歷史主義」。(10)

1993 年夏，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杭定頓 (Samuel P. Huntington) 在《外交事務》學刊發表了一篇文章，認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衝突的時代」已成過去，即將來臨的，是「文明（或

文化) 衝突的時代」，尤其是「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 (以儒學文化與回教文化為主) 衝突的時代」。這篇文章受到不少注意。從文化學的觀念來看，最值得注意的是杭定頓幾乎完全揚棄了前述由「科學主義」主導的文明進化論觀點。根據這觀點，物質文化所構成的經濟基礎，和發展此基礎的科學技術，不但是構成一切文明最重要的共同因子，也是衡量一切文明最重要的共同指標，和一切文明發展的共同鵠的。這種理論認為世界各種不同文化的差別，只是在進化程度上「先進」與「落後」的差別；東西文化的差別只是「傳統」與「現代」的差別；世界危機和困局只是局部地方進步遲緩、現代化有困難的問題，而不是不同文化衝突的問題。這些文化發展的結果必然脫出「傳統」，進入「現代」，而融入西方所建樹的「現代文明」。杭定頓最近的看法，卻是認為當代世界各種不同的文明，可以保持甚至增強其語言、思想、信仰、價值觀念等精神文化上的特質，無須「西化」，也可以取得現代化的財經、科技、武裝量，而成為現代文明。因此而導致未來世界性多元文明衝突的危機。換句話說，決定一文明本質的，不是財經、科技、武力，而是「思想文化」。(11)

「文化史」由強調低層物質、經濟、社會狀況，轉而注重高層精神生活的內蘊涵義。這本來是中、西思想文化研究的舊傳統，最近則成為「思想文化史」發展的新機運。這是「思想文化

史」作為一特定新名詞的第二種意義。不過這只是一新機運，要形成巨流，尚有待關注「思想文化史」學人的共同努力。在「思想文化史」的新義尚未成為約定俗成的共識以前，我們仍然依其舊義，「思想」與「文化」研究兼收並蓄，希望能夠海納百川，以收集思廣益之效。

陳啓雲謹序

十四總 序

註：

- (1) 見陳啓雲《錢穆師與「思想文化史學」》（「錢穆先生百歲冥壽紀念專題演講」，台北市立圖書館印，民國八十四年八月），「附錄」，頁 37-42；重刊於《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第四期（台北，1996），頁 83-87。
- (2) Lynn Hunt,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Introduction", pp.16。Roger Chartier, "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 The French Trajectories," in Mominick La Capra and Steven L. Kaplan ed.,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eappraisals and New Perspectiv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3-46。都特別提出了「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 和「思想文化史」(Intellectual History) 在當代西方學術界中含混不清的現象。
- (3) A. L. Kroeber and Clyde Kluckholm,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Peabody Museum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52), pp.43, 64-65.
- (4) Elvin Hatch, *Theories of Man and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13-19, 135-144.

(5) Hatch, p.1; Kroeber and Kluckholm, pp.43-44, 47-48.

(6) 同(2)

(7) UNESCO, *History of Mankind*, Vol.1,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3), pp.xii xiii .

(8) Elvin Hatch , 見(4), pp.14;39, 58-65; 95-96; 112, 114-123; 169-170, 176-177; 218-219; 241-245, 250.

(9) 見(2)

(10) Dominick LaCapra and Steven L. Kaplan, 見(2), pp.47-110. John E. Toews, "Intellectual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Autonomy of Meaning and Irreducibility of Experie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2:4 (October 1987), 879-907. Richard Harvey Brown, "Positivism, Relativism, and Narrative in the Logic of the Historical Science," Ibid. 908-920. Allan Megill, "Recounting the Past: 'Description,' Explanation, and Narrative in Historiography," Ibid. 94:2 (June 1989), 627-653. "AHR Forum:

The Old History and the New," Ibid. 654-698. Brook Thomas, *The New Historicism and Other Old Fashioned Top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3 (Summer 1993), 22-49; "The Coming Clash of Civilizations — Or the West Against the Rest," *New York Times*, June 6, 1993. 關於此「文明觀」的討論，見陳啓雲〈歷史與文化・思想與哲學：人文學理論反思〉《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四卷第三期（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民國八十三年九月），頁 7-8。